

浅析开发对区域内居民生计的影响

——以凤凰县千工坪镇新崇礼村为例

郑丽娟¹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通过对凤凰县千工坪镇新崇礼村走访调查，进行相关案例分析，探讨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区域开发对居民生计的影响。

【关键词】 区域开发 居民生计 影响 新崇礼村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的“区域转向”，转而开始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变化。而“开发”又是区域史中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区域史在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区域开发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龙先琼的《近代湘西开发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区域史为视角》，强调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并主张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顾朝林、赵晓斌合写的《中国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通过资本流动对中国区域开发的作用研究，概括了中国传统区域发展模式——“内陆军服”和“沿海先富”及其存在问题；刘艳军、刘静、何翠、冯媛的《中国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的耦合关系演化》，以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耦合关系为主线，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尺度，从宏观上定量分析评价中国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的耦合度及变化特征，探讨了中国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演化的影响程度及驱动因素。但是多数成果多集中于研究区域中开发与生态环境、政策等之间的关系，少有从区域开发的角度来研究居民生计的作品。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结合所学知识，以凤凰县千工坪镇新崇礼村为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开发对于居民生计的影响。

1 田野点概况

新崇礼村（又称为田冲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镇西部，距乡政府 8km，东接报子洞村、塘公坨村，西邻麻冲乡，南接都里乡，北靠山江镇，2 个自然寨（上田冲、下田冲），辖有 5 个村民小组（上田冲为 1 组、2 组和 3 组村民，下田冲则为 4 组和 5 组村民），全村共 160 户，708 人。新崇礼村为苗族聚居村，说苗语，“彭”“张”“龙”为该村三大姓氏，全村耕地面积 679673m²，山林面积 2113m²，平均海拔 420m，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是凤凰古城、沱江河上游的重点生态保护乡。

早前，在这样的地理气候和人文环境下，新崇礼村形成了以种植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维持生活所需，很少能转移到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随着各地区扶贫开发力度的快速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

¹作者简介：郑丽娟（1993-），女，湖南泸溪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MZ030，12CMZ025）。

统上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被打破，新崇礼村民的生计从最初的“满足生存”转变为“追求财富”，经历了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传统生计方式到以种植业、畜牧业、外出务工及多种副业于一体的多元生计方式的转变，实现了生态与开发的有机结合，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

2 调研结果及研究发现

研究区域开发对新崇礼村民的生计的影响不仅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回应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凤凰县千工坪镇新崇礼村的两个自然寨进行走访调查，并结合调查记录进行相关的案例分析，探讨在“乡村振兴”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开发对新崇礼村民生计和生产生活的影响。

2.1 交通运输与居民收入

与平原地区相比，这里的传统生计尽管也是以种植业为主，水稻在种植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当地的居民还要种植其他农作物，如土豆、萝卜、辣椒等蔬菜，还有一些小杂粮。除了种植以外，还会饲养家禽家畜，但多数用于自己食用。造成这种自给性很强的生计模式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二是在外界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客观需要涉及到众多生物物种的利用”。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外界的商业刺激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交通条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据该村村民介绍，相较于其他地区，该地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便是交通不便。以往若是去赶场，得走小山路，由于人力有限，因而只能带一些轻便的物品去镇上销售，如此一来，重量型的高经济效益的商品难以进入市场，即使进了市场，也会因成本（运费或所付劳力）而变得很不划算。因此，通路便是开发该区域中的第一步。目前，去往该村的公路已挖通，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去了便利，如村民龙先生购进了一辆三轮车，一次载 200kg 左右的西瓜，不除成本一次能挣 500 余元，而这主要得益于交通的便利，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成本投入。

2.2 国家政策与居民生计

此外，这种便利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这个小山村而言，他们在传统的生计中种植过水稻，饲养过家禽家畜，而且至今仍然从事着这样的生产活动，但是，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不同之处在于“之前仅为自己食用或喂养牲畜种植，而今却是为换取现金而种植”。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外部市场需求的刺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开发政策的扶持。

2.2.1 政策扶持。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地方交通运输条件的迅速改善，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如此一来，加大了城镇对农作物的需求，从而促使人们通过不断扩大生产以提供城镇居民消费并换回数量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使得该地地方政府在开发方式的选择上，既要保证当地生产和收入的稳步增长，又要确保生态在开发过程中不被破坏。该地政府以传统生计方式为基础，结合该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并巧妙地运用了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高经济效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结合，不仅拓宽了村民的致富之路，还很好地回应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这一主题。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无污染、绿色生态的农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近年来，凤凰县采取“‘政府扶持、项目带动、农户参与’的形式，积极整合扶贫资金 1200 万元，组织实施了‘稻花鱼养殖重点产业扶贫项目’，选择在水源条件好、集中连片地区建立高标准稻田生态养鱼示范基地，统一进行田间改造、苗种供应和技术培训”，大力发展稻田综合种养。该村水资源丰富，大大小小的凉水口就有近 20 处，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而且够一辆小三轮车出入的水泥通道已经通往各家各户，如此一来既满足了水源需求，又方便了材料的运输。据介绍，该村村民彭先生利用当地政府发放的鱼苗，目前经营着 2668m² 稻花鱼，总产量

可达 1.5 万多 kg，按市场价格 11 元/kg 或者 12.5 元/kg，总价值可达数十万元。这种人工水域的建构不仅满足了稻、鱼在同一耕作系统中的和谐并存，而且还体现了高超的耕作智慧。实施水稻和稻花鱼的生态种养，不仅稻花鱼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稻谷的收购价也比普通水稻高，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如此一来便实现了经济收益与生态平衡的和谐发展。

2.2.2 生计现状。

随着扶贫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实施，不仅在该地居民生计中占重要地位的种植业发生了变化，而且养殖业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该村村民龙女士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于去年开始养猪，并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资源和通往各家各户的水泥通道建起了总面积约为 300m² 的白猪养殖场，养殖场建在住房边上，靠近水源，设有自动化的水龙头，而且每隔一天冲洗一次猪圈以保持猪圈的清洁卫生。据龙女士介绍，这种当地猪生长速度快，繁殖力强，易成活，不易害病，属肉用型，一般一头成年公猪体重能达到 150 多 kg，成年母猪体重约为 130kg。此外，母猪的繁殖力强，一年能产两次幼崽，每胎能产仔 10 到 12 头，且成活率高。在其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不仅提供部分猪苗，还传授养殖技术，如给小猪崽打疫苗：养殖户可以去千工坪镇领取免费的疫苗，然后根据专业人士的技术知识传授及其现场操作，回家后自己就能给猪打疫苗。此外，还有猪的食料的搭配和母猪的配种及产后护理。据介绍，母猪成长到 60 多 kg 时就进入了发情期，发情期的表现为兴奋不安，食量明显下降。母猪的发情时长为 3~4 天，一般发现此种症状 2~3 天后出现黏液就可以进行人工授精。同时，在配种过程中也需要对母猪进行清洗消毒，防止母猪感染，而且还要准备充足的温热的盐水给母猪饮用，分娩后 8 小时不宜喂食，第二天喂以流食，之后再逐步恢复食量。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专业人士的专业养殖技术知识的指导下。据了解每隔一段时间，张先生就会去找千工坪镇上的专业人士交谈养殖经验，讨论养殖中遇到的问题，专业人士也会给予技术指导。目前，龙女士家共养有 60 头猪：45 头小猪，15 头大猪，其中有 14 头母猪，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若不计成本的话，一年的总收入近 11 万元。此外，龙女士共种有 4670 m²~5330m² 的玉米，单产约为 500kg/667m²~600kg/667m²，水稻种得较多，约有 13300m²~20000m²，单产约为 650kg/667m²~700kg/667m²。但是这些农作物只有一小部分用于食用，满足生存需要，而绝大部分用于喂养白猪并以此来换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2.3 调查发现

由此可见，虽然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布局、政策和市场等因素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和扶持却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对农村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地方政府不仅是区域经济开发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着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其制定的开发政策也影响着该区域内居民的生计方式。如上述材料所展示的，无论是养猪，还是养殖稻花鱼，地方政府的扶持不仅提高了养殖户的收入水平，而且也加快了该农户由单一化传统生计方式向多元化生计方式的转变速度。

2.3.1 变化。

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期，探索、创新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变迁关系着能否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和做好现阶段民族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且随着改革开放、扶贫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实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打工经济”的出现，民族地区农民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本文所关注的新崇礼村农民的生计“从最初的‘满足生存’转变为‘追求财富’”，经历了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传统生计方式到以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及多种副业于一体的多元生计方式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扶持、民族文化的交流、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民自身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崇礼村农民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单一化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化，而且这种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深入。这种向多元化发展的生计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密切相关，不仅得益于人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传统生计方式的文化力量，更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对乡村振兴战略来讲，或是在农村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国家政策给予的技术、资金扶持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上所述，因

而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确定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落实，根据本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引进人才、资金、技术为重点方向和目标，优化人才环境，使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2.3.2 挑战。

但不可否认，在现今经济状态下，新崇礼村的发展面临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崇礼村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大量外流。随着生计方式的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到发达地区打工，村中遗留下来的且能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大片的耕田旱地渐渐荒废。此外，很多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后，很少有人再回到农村，建设农村，这种劳动力的外流也可以说是人才的流失。第二个问题便是重视经济发展，轻视文化发展理念。文化是农村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沉淀，是农村人与物两大载体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这种沉淀下来的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其一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外界的刺激下越来越倾向于追求被现今的社会认为是先进的事物，例如新崇礼村的部分居民推倒了老房子，建起了砖房子（就新崇礼村而言，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不注重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以及村民的无意识）。在这些已经被推倒的老房子中，有很多房子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们蕴含着先辈们的智慧，见证了数代人的成长，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区域开发过程中，这种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民俗、民风、民居等文化要素的保护）意识的缺乏，也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第三个是广大的农村居民缺乏新时代意识的培养。广大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成效的受益主体，因此，应提高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培养农村居民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3 结语

国家政策扶持下的区域开发对该区域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加快了区域内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新崇礼村农民的生计从最初的满足生存转变为追求财富，经历了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传统生计方式到以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及多种副业于一体的多元生计方式的转变。不可否认，国家政策在区域开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该区域居民的生计。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是在推进融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要素于一体的系统的区域开发工程。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政策的主导性地位，转变过去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从农民生计方式等不同层面入手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 [1]龙先琼.近代湘西开发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区域史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2012,33(5).
- [2]顾朝林,赵晓斌.中国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J].地理研究,1995,14(14).
- [3]刘艳军,刘静,何翠,等.中国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的耦合关系演化[J].地理研究,2013,32(3).
- [4]崔明昆,汪斌.从玉米到蔬菜:一个山镇生计变迁的文化生态解读[J].原生态民族化学刊,2015,7(4).
- [5]石永忠,彭英海,何斌.湘西州:稻田综合种养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建议[EB/OL].湘西州畜牧水产局,2016-11-09.
- [6]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6(6).
- [7]宋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农民生计方式变迁研究[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7.